

运河

CANAL · SOUTH



3
DEC. 2016
VOL.1 NO.3
总第3期·季刊

名家名篇：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

运河故事：
一条运河哺育四大名著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
西风过眼水长东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

泼墨·弄清彩

水墨江南





3
DEC. 2016
VOL.1 NO.3
总第3期
季刊

运河志愿者之歌

撰文 | 张建青

点燃你的激情
汇聚我的能量
为了一个不变的承诺
我们一起洒下芬芳

敞开我的心扉
闪烁你的光亮
为了一生永恒的追求
我们一路神采飞扬

在我们和世界之间
架起爱的桥梁
播撒感恩的种子
收获最美的目光
用微笑温暖四方

在我们和世界之间
扬起爱的风帆
绽放生命的璀璨
传递慈善的信仰
用真诚为你的快乐导航
这里正是人间天堂

主管：杭州市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
主办：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编委会主任：黄玲
编委会副主任：刘德龙 陈展 戴丽群
编委：陈琳 阮利平 陆菁 沈丽红
文闻 黄莹 许赞 焦明
杨芳 夏菡茜 张建青 孙辰霏
杨建英 乔国良 江小娟 吕英娟

主编：叶艳萍
执行：陶林
责编：周佳
设计：杭州解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编辑部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1号
邮编：310015
投稿邮箱：276476005@qq.com
电话：0571-88162078



智慧一点通



杭州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目 录

卷首语

01 运河志愿者之歌 - 张建青

名家名篇

04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下) - 李 泉

运河故事

14 一条运河哺育四大名著 - 乔昱佳 马云云 李 钢

20 清代杭州籍河道总督——吴嗣爵 - 胡梦飞

24 临河清调·运河号子 - 张 瑞

运河风情

34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 - 孙宗广

42 西风过眼水长东 - 孙宗广

运河史话

50 京杭大运河名称考 - 顾丽娟

55 运河拱墅段后申遗时代建设的思考 - 石永民

运河遗存

62 运河第一香 - 焦 明

64 我心如秤 - 夏菡萏

66 大运河水脊 - 周 佳

八面来风

74 中国京杭大运河摄影作品展开幕

75 第三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落幕

76 拱墅区举办 2016 年太极导引功表演赛

77 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78 杭州大运河庙会重溯古钱塘盛景

80 2016 京杭大运河自行车超级挑战赛杭州收车

封三 运河文化沙龙体验点：荣华戏园

名家名篇

MASTERPIECE



齐之鱼盐，鲁之束粟，吴越
之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
奇珍异巧之物，秦之罽毳，晋之
皮革，皆荟萃其间。



中国运河文化及其遗产保护 (下)

撰文 | 李 泉

李泉，男，1949年生，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上接第二期杂志)

如果说区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只是物化半物化的、浮在社会表层的文化现象的话，那么精神文化则是深层次的、最能代表区域文化本质属性的文化现象。区域精神文化的形成根植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土壤中，而以区域内部文化沟通与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融汇碰撞为根本动因。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流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南北各地的源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运河将各种区域文化连结在一起，漕运、商业活动及社会各阶层的南北往来，带来了南北

文化的交汇融合，使得运河区域人们的心理心态、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逐步趋同。以宗教信仰来说，明代以前运河北部京津齐鲁地区的宗教及民间信仰比较单一，除了佛、道信仰及官方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外，较为普遍的神灵崇拜只有东岳大帝及碧霞元君崇拜。而运河南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宗教信仰则复杂得多，具有明显的泛神崇拜性质。运河畅通后，商业的繁荣及对水运的倚赖，使得北方运河沿线的城镇及乡村中，行业神、自然

神和圣贤神的崇拜日益增多，运河南端的神灵也降临到了北方运河地区，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如起源于福建传播于江浙的天妃（又称天后、妈祖）信仰沿运河向北传播，至清代，山东京津的运河城镇大都建有天妃宫。同样，北方的神灵也泊去南方，受到当地人的尊崇。如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山东济宁一带兴起后，沿运河迅速向南北传播，不仅“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1]，“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四大王庙”^[2]，从史料记载来看，运河南部的宿迁、山阳、京口、南京、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都建有金龙四大王庙^[3]。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文化的形成，与运河之外的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各地商帮在运河区域的活动。明代运河一通，徽商便相机而动，迅速在运河区域开拓市场。明中后期，晋商进入运河区域，入清后更是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另外，来运河区域经商的势力较大的商帮还有江苏的洞庭商帮、江宁商帮、太仓商帮，有江西商帮、浙江商帮、闽广商帮、辽东商帮等。他们或在运河城镇设立店铺，或从事长途贩运，运河沿岸的政治中心城市且不说，就连东昌府辖的张秋小镇，也是“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



织文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鬲毳，晋之皮革，皆荟萃其间”^[4]。各地商人纷纷在运河城镇建立会馆，将本地的建筑技术、雕刻绘画艺术、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带到了运河区域，将各地文化渗入到运河区域的本土文化中。另外，上自皇帝高官，下至工匠艺人，南来北往，无不通过运河。外国使节商团人等，也都通过运河北至京城，南抵沿海港口。运河区域的开放性及其大量的人口流动，使运河区域能够吸纳其他区域文化，融会各地的风情民俗，形成异于本土文化的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和社会风貌。

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南北长 1700 余公里，而它所流经或辐射的区域东西一般不过数十公里，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狭长的文化区。它穿越了由古代燕赵文化区演变而来的京津文化区、受齐鲁文化浸润颇深的山东文化区、在古代吴越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江浙文化区，由于京杭运河各河段源文化的差异及各河段自然地理环境、河道设施（闸坝码头等）、管理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不尽相同，所以在运河文化区域中，不同河段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当时各河段有不同的名称：“漕河（指京杭运河）之别：曰白漕（北京至天津段）、卫漕（天津至临清段）、闸漕（临清至苏北段）、河漕（徐州到淮安段）、湖漕（淮安至扬州段）、江漕（江苏南部段）、浙漕（浙江段），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5]，人们又习惯于将运河自北向南各河段称为通



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江南运河，说明各河段河道有不同的特点。明后期一位朝鲜官员自宁波、杭州沿运河北到北京，返国后写下了自己对运河南北地区文化同异的体察，他说：中国南方和北方有许多共同习俗：“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摇手，怒必蹙，口唾沫；饮食粗粝，同桌同器，轮箸以食；虬虱必咀嚼；砧杵用石；运磨使驴、牛；市店建帘标；行者担而不负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6]，但同时也发现了以长江为界南方和北方在房屋建筑、风俗习惯、文化修养、生产方式、上下级

关系、装束穿戴、丧葬习俗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整个明清时期，在运河不同河段、不同地区，运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些小的差异，大体说来，越是相距远的地区，文化差异越明显。

运河文化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它的内涵不尽相同。在文化演进过程中，新的文化现象不断出现，使得运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某些旧有的文化现象则逐渐消亡，不再为后代人所接受或认同。因此运河文化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学研究——面对现实之物、阐释与现实有关的文化现象，还应该是历史学的研究——反观

往古，探寻历史时期文化的内容、特点、作用及发展演变的历程。

三、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

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运河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中国运河文化遗产有哪些特点。

文化遗产，简单地说，就是文化方面的历史遗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的“世界遗产”的定义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

观，是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大运河“申遗”申请的是第一类。

运河文化是运河区域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与运河密切相关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运河文化遗产就是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遗存，它是被传承守护至今的珍贵文化宝库，是运河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了解中国大运河和运河区域历史文化的基础。

运河文化遗产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

王戈/摄





物质文化遗产，也叫有形文化遗产，是指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的至今仍有实物留存的运河水工遗存、文化遗址等。另一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叫无形文化遗产，是指与运河有关或因运河而形成的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还包括运河开挖、河道管理及航运管理方面的规范制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说这种文化遗产完全没有物质的依托，而是说它的文化意义不能够主要或全部体现在某种物化的载体上。这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通过掌握某项技能的人或团体来传承和体现的。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定和保护，往往是把无形的技艺和掌握技艺

的人联系在一起。前文论述的运河文化遗产是广义的运河文化遗产，狭义的运河文化遗产则专门指物质文化遗产。这次申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便是狭义上的文化遗产。^[7]

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是一条叠加的文化线路。上个世纪末，国外学者提出了“文化线路”的概念，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8]，将“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简单地说，“文化线路”是指线性或带状区域内的文化遗产族群。在这里，我们要关注两个要素：其一，文化遗产呈线性或带状分布，是一个文



王戈/摄

化长廊。其二，它不是单一的文化现象，而是一个文化族群，是一种叠加的、层累的文化积淀。中国长城、丝绸之路是文化线路，大运河也是文化线路。从保护的角度看，文化线路越长，保护的难度越大。

2. 大运河文化遗产点分散，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很大。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包括各种不同的水体、水工、建筑，遗产点之间不连接，许多遗产点已经改变了它所产生的自然及人文社会环境，而存在于人们的生产区、生活区内。非运河文化的因素时常会渗入、干扰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如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聊城梁水镇土桥闸，不仅全无河道，

而且处于荒野农田之中，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功用，这无疑会增加保护的难度。

3. 各遗产点的构成差异大，保护方法差别也大。有些遗产点可观赏性强，如南方的历史文化街区。而有些遗产点可观赏性差，如北方的河道、船闸。观赏性强的遗产点，易于受现代审美观念及市场需求的影响而改变其内涵，观赏性差的遗产点则因不受重视而失修损坏。

因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不同，存在状态不同，所以在保护运河文化遗产方面，也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应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 统一规划。运河文化遗产分布于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 8 个省市、25 个地市，遗产点河道上千公里，分布线路长度 3 千公里以上。所以，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统一规划、协调一致，否则会影响它的整体性。

2. 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运河文化遗产点和现代生产区域、生活区域错杂分布，不便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却可以提高区域文化品位，优化文化环境。事实上，将运河文化遗产点和其他区域完全分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关键在于使广大民众认识到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自觉地加以保护、维护和传承。

3. 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提到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便会和地方旅游业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要切记：首先要做好保护工作，在不损

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旅游文化开发，务必避免重开发轻保护的做法，更不能迎合某种潮流而损害、改变遗产点的历史文化内涵。

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定，目前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运河文化遗产的特点，社会各界也有清楚的认识。但是，如何保护、利用运河文化遗产，特别是申遗成功后，怎样进一步对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清理、修整、保护、开发、利用，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看待运河文化遗产，进一步提高沿线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把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探寻出一条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运河故事

CANAL STORY



注释：

[1]【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

[2]【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金龙四大王》。

[3] 参见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3 页。

[4]【明】于慎行《安平镇新城记》，载道光《东阿县志》卷二十《艺文》。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运河》上，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078 页。

[6]【朝鲜】崔溥《漂海录》，载葛振家《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 2002 年版，第 194 页。

[7]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包括 27 段河段和 58 个遗产点，共 85 个遗产要素。其中运河水工遗存（包括运河河道、与运河直接连接的湖泊）63 处；运河附属遗存（保障运河运行的配套设施、管理设施）9 处；运河相关遗产（与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联结的相关古建筑群、历史文化街区）12 处；综合遗存（由多处河道、水工设施、相关古建筑群或遗址组成的文化遗产）1 处。

[8] 关于《文化线路宪章》的基本内容，请参见王云霞主编《文化遗产法教程》，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336-337 页。

一条运河哺育四大名著
清代杭州籍河道总督——吴嗣爵
临河清调·运河号子

一条运河哺育四大名著

撰文 | 乔显佳 马云云 李钢

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静静地流淌了6000多年，它的贯通，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中国明清时期最重量的一批小说，几乎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四大名著」的面世。

曹雪芹、吴承恩居运河畔写传世书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齐鲁晚报发起的京杭大运河徒步考察活动到此采访发现，这里还是《西游记》这部“天下第一奇书”的诞生地。

作者吴承恩的故居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是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吴承恩是淮阴山阳人，具体说就是河下镇打铜巷人。除了长期在淮安生活，晚年创作《西游记》时也是在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

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些当地人回忆说，在张家湾城墙南城门内侧，曾有一片四合院，其中就有曹雪芹家族遗留的一些商铺。可惜十年前在一次片区开发中被拆毁。

曹雪芹的父亲曹頔、祖父曹寅，都曾经做过江宁织造一职，为皇宫生产绸绢。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江宁织造当时除了管南京，还管理大运河畔另一处全国性的丝绸织造中心苏州。曹氏家族正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往来，生平际遇也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水浒故事沿运河广流传

除了吴、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

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即今天的淮安。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北京）、东平、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蓼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片水泊，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济南社科院副院长张华松介绍，明代小说创作空前活跃。为什么是施耐庵写出《水浒传》？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繁华市井催生《聊斋志异》等小说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明清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





陶林/摄



张华松介绍,《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一说在阳谷),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榛,大才子谢榛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

“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凌濛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鹗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在一次会上讲到,《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

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均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张华松分析,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也有助于文化的创作与传播。■

清代杭州籍河道总督——吴嗣爵

撰文 | 胡梦飞

吴嗣爵(1707—1779)，字尊一，号树屏，浙江钱塘人。八岁时丧父，幼随祖父、礼部主事吴之琦寓居平湖，母亲钱氏严厉督促他求学上进，后因拜新仓(浙江平湖新仓镇)名士俞永祺为师，遂落居新仓。

雍正七年(1729)中举人，列三十七名。次年，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大学士张廷玉上奏改任吏部主事，再迁郎中。吴嗣爵博学强识，精通典章故事。

乾隆六年(1741)，授常州知府，再授保宁知府。此后，又先后担任湖北、福建两省学政。

乾隆十三年(1748)，授官淮安知府，后升任淮扬道道员。当时洪泽湖水暴涨，按常例应开天然坝泄水。吴嗣爵认为开坝泄水，虽能消减湖水暴涨，但会对下游地区民众的生命财产产生危害，故坚持不开堤，最终得以无恙。

乾隆十六年(1751)，调任两淮盐运使。

乾隆十八年(1753)，再授官淮扬道，适逢其母去世，因淮扬道兼管河工，事务繁忙，乾隆皇帝闻知后，亲自下令“夺情”，只给其两个月时间为母服丧守制。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升吴嗣爵为江苏按察使，后改任江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后调任湖南布政使。在未赴湖南上任前，他上折奏请缓征江宁等三十五州县积欠应征口粮。乾隆帝闻奏后，询问江苏巡抚

恩多，乞恩多上折回奏江宁等州县庄稼丰收，不应再请缓征。乾隆帝知情后，责怪吴嗣爵借口缓征推卸过错，并且为其下属催征不力掩饰，下令将他派往江南河工，以同知任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吴嗣爵补任宿虹同知，仍授官淮扬道，移淮徐道。时黄河大涨，危逼徐家庄缕堤，吴嗣爵督率官员抢护，受命署理河东河道总督。不久因任两淮盐运使时，商人侵吞提引公费之事被揭发，获罪被降调，后改为革职，仍留原任。运河两岸的堤防，临清以北为民堰，南旺以南为官堤，自临清到南旺，则官堤、民堰交错。

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吴嗣爵奏请修补丁庙、六里、南旺、荆门、戴村等地闸坝，凡是民堰薄弱残缺的地方，督令修筑，而官堤则酌缓急依次培补修筑。乾隆皇帝闻知后，降旨嘉奖。南旺湖北高南低，在运河西岸，恰好是分水口的要冲。每年夏秋汶水大涨，自关家、常鸣等斗门灌入，只能收水入湖，不能出水接济运河。

乾隆三十五年(1770)，吴嗣爵在仔细勘察后，奏请在南旺下游土地庙前增建一座石闸，按时启闭，以接济运河。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七月，黄河秋汛暴涨，吴嗣爵会同河南巡抚何焯督率员弁，备加防护，最后涨水全消，堤工得以保全，吴嗣爵等人亦交部议叙。

乾隆三十六年(1771)八月，吴嗣爵升任江南河道总督。上任伊始，正值徐州黄河大溜，吴嗣爵在亲自视察黄运两岸堤工后，奏请修整徐州铜沛、邳睢等处埽工，并对上下引河中泥沙停积之处进行挑浚。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奏言：清口旧有木龙五架，臣请将第一架移于第五架迤下七十丈，建立新长淤滩一百三十五丈。第三架溜势稍缓，原长五十丈，应改造减去二十丈，足资捍御。即将改减之木于新移木龙四十丈之下，紧对陶庄，再移建一架，新淤更资保护，溜势亦可北趋。十月，吴嗣爵奏言淮安黄河北岸王营减水坝用于减泄清黄异涨之水，保护黄河下游山阳、安东各厅堤防，极为紧要关键。但因年久损坏，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请于该坝下另建石滚坝一座，以备开放。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上

奏清口东西坝口门，蓄洩启闭，为全河关键。查洪泽湖高堰志桩，上年冬底，原存七尺，东西坝口门留宽二十丈。目下湖水盛增，水志亦渐次加长，督率随同官弁，将东坝先拆十丈，口门共宽三十丈，以资宣泄，得旨嘉奖。

八月，淮安黄河水势陡长。又连日雨大风狂。所有南岸老坝口迤下堤工于十九日子时。决口七十余丈。大溜全注缺口，由山子湖、达马家荡射阳湖归海。附近之板闸淮安一带，俱被水淹。居民房屋人口，间有坍塌，乾隆帝命吴嗣爵会同高晋迅速调集工料，加紧堵筑。自九月初八日开工进埽，于二十八日合龙。

十一月，吴嗣爵奏言高堰、山盱一带临湖砖石工程，屡经风浪撞击，多有倒卸，续于十月十四日复被大风昼夜掀掣，砖石旧工，又多塌卸，亟应勘察办理。乾隆帝命其会同高晋





督率工员，迅速办理。

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吴嗣爵奏言徐州黄河由丁家集自北向南，北岸新滩直入河心，以致冲漫南岸民堰五百多丈。毛城埔河水流量较大，下流亦不能蓄容。认为应将河头收正，测量河水流量，并在黄河北岸故道处疏浚引河，待第二年春天相机开放引河，使黄河改由北岸向东流，不令其注入丁家集等地。里河厅运河口设有惠济、通济、福兴三闸，其中惠济闸是淮水入运河的关键。因年久失修，闸身业已通体坐陷串漏，底桩朽烂空虚，关石俱已移动。吴嗣爵认为该闸为淮水入运首闸，水势赖其节制，必须拆卸到底，重新签桩，逐层砌造，奏

请对其进行重修。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奏言淮安清口和洪泽湖相连的引河共五条，在洪泽湖尾部，请分别筹划疏浚，用以接济运河。不久，又奏言五条引河中张家庄、裴家场二河水泄流，应加以疏浚并加宽加深，乾隆帝皆允其奏。三月，乾隆帝东巡，吴嗣爵至行宫觐见，回答问题时，颇不合乾隆帝心意，故遭到罢免，改任其为吏部侍郎，其江南河道总督一职改由江苏巡抚萨载担任。

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吴嗣爵奏请致仕，获得批准。乾隆四十四年(1779)，吴嗣爵去世，年七十三岁。其子吴璈，《清史稿》有其传记。吴璈受父亲的影响，不但自小就熟悉河务，而且特别关心河事。

乾隆五十九年(1794)，吴璈正在充当某乡试的监考官，听到河水暴涨的消息后立即走出考场前去救防，乾隆闻听后对其精神大加赞赏。嘉庆四年(1799)便任代理东河总督，不久又被正式任命。此后又分别于嘉庆十一年(1806)、嘉庆十九年(1814)、嘉庆二十五年(1820)被委任东河总督，是历任东河总督中被委任次数最多的。■

参考文献：

1. 《清史稿》卷 325, 《列传一百十二》。
2. 《清高宗实录》。
3. 《碑传集》卷 76, 《诰授光禄大夫予告吏部右侍郎前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总督吴公嗣爵合葬墓志铭》。
4.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 6, 《职官志》。
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79, 《吴嗣爵》。



号子

临河清调·运河

撰文 | 张 瑞

我们会走向哪？我们只能在这临河而歌的清调之中，听到过去，体会惆怅，而消逝的事物，一如那些号子，一如那些声音，一如那些光影，无影，亦无形迹。

恰是逝者如斯的那一声叹惋呵，号子声声……



有一次听到一个老人临河唱劳动号子，让我认识了号子。

我对号子的印象一向不大好，大概是因为以前听到的号子都是舞台上的，比如船工号子——《伏尔加船夫曲》，据说比较经典，印象中，这歌唱起来多用低沉的男中音，嗨嗨吆嗨，嗨嗨吆嗨，沉重而苦大仇深着。配了列宾的画来看，是白桦林的背景，褴褛的衫，情绪很怨愤。细听那歌词却是——“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觉悟如此，倒让人觉得这哪是纤夫，这是革命者。披荆斩棘，有着一肩的使命感和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气质也只能是俄罗斯的，比较形而上，哲学。

中国的号子里《川江号子》比较有名，是一腔战天斗地的情怀，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想来川地地险浪急，号子也必得慷慨激昂着才会合调。但我实在不太喜欢那种川味的冲撞，有一种不管不顾的蛮。音调又硬气，说话唱歌都是端起了架势在吵架，一腔的不和气！

《黄河号子》的气势也是有，可也脱不了一个苦字。画面是澎湃的浪，打着漩的水涡，

滚滚河水、天皇地苍，那号子里天生出一种苍凉，悲声悲气地，是怨。

当然，舞台上不苦的号子也不是全无，像《乌苏里船歌》，可惜太规整了。大概乌苏里那地方确实鱼肥稻香，风光如画，日子过得舒坦，所以那船号也绝不押韵，只是中规中矩地合辙合调着，是满心的满足与欢喜。可惜齐整得过了，就没有了船歌的野和粗犷，细致成了赞歌。赞歌总是不那么讨好的东西，于是这船歌也就有了舞台化的假气。

直到听到运河号子，是运河边临河而歌的原生态的劳动号子——打夯、行碛、起航、摇橹、拉纤、绞关，凡是需要群体的劳动，都要有号子，那号子因为是生活的原汁原味，就有了热气，有些意思了，是一些跟那些舞台上的号子不一样的气质。

运河这地方，这沿途，本就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土沃、人足、物丰，人间的好它都有了，所以讨生活也不见得那么艰辛。还有那河淌过的地界，是被圣人的思想调教过的地界，世风人情里天然地有着文化的意味，表现在号子里，

那号子就不蛮气，就不怨愤，而是有着平和的耐听。

这样的气质表现在号子的词里，那词就会有一种好看。

大凡号子，嗨吆嗨吆，虚词构成主体，内容往往无味，“抬起来，下下腰”之类的，号令而已。就像诗经里的《芣苢》（《芣苢》应该是一首采集号子，是用来唱的，若要读，味道总是寡淡）：采啊，（嘿呦）。捋啊，（嘿呦）。装啊，（嘿呦）。运啊，（嘿呦）。而已。“嘿呦嘿呦”，这本是号子存在的理由。各地的号子里，也多是这样用简短的动词构成内容，用“嗨呦”构成回应，而运河号子不，运河号子的歌词里是有内容的，这些内容让“抬起来，下下腰”这样的功用性动词都沦为了附庸，使号子脱离了它的实用性价值而升华到了艺术的层面上去。号子就不仅仅是号子，号子成了歌和诗。唱号子也就不仅仅是为了整划动作，唱号子里都有了娱乐功能，劳动就像了舞蹈。（如此想来，艺术起源于“劳动说”倒也不妄，这些号子在提供着佐证。）

这种特质，使运河号子别具了一种劳动号子里少有的气象。这是让我欢喜着的，而这份欢喜的印象是来自于一个老人，运河边上的老人，唱号子都成了他对当年生活的回忆，这样的回忆本来也是一种很有意味的形式。听老人临河高歌，那号子在岁月的另一端嘹亮。

曾经，那号子是配了古码头，来来往往的高大的船，沿河的热闹，青青的河柳，还有楼上的红灯笼的。曾经，那号子是你应我答，此起彼伏，渲染着日子热热闹闹与生活的富足

安康的。曾经，那号子是承载着好男儿一腔的血性、满身的胆气与日子里的挥汗如雨的。而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而今真正的运河号子是听不到了，那些消逝的声音本来只是些记忆中的事物罢了。这种记忆的底色笼罩出一些萧索的气氛，就愈是衬出了号子的嘹亮。

在北运河段的某个乡下，一个老船工，七十多岁了（能唱号子的船工大多不会低于七十多岁）。他圆头大脑，虎虎生气，老了，神气里也多是这种虎虎生气。运河沿岸多地广土肥，生活滋润，那人，便会格外地有一种健朗的肢体，舒朗的气度，性情里有着一些平和，神情里便多着一份乐呵。还有口音，很沃的土气，吐字不会艰涩，但会很重而宏，又有了水气的滋养，那音调就并不嶙峋，反是肥腴了起来，实字的宏气与尾音的绵软就很会有一种对比的效果，简直像极了“虎头”“蛇尾”这四个字的形象意蕴。

这老人年轻时在运河上讨生活，南来北往的见识足，叙述的态度又多肯渲染，便显得健谈爽朗，不像一些山里的老人，只穿青色的衣衫，言谈很干涩，骨子里是拘谨。这老人着白色的汗衫，言语又生动，最要紧的是他的那份运河上讨生活而造就出的自信，不怕生、言谈有内容，而他本来也对自己的有内容而自信满满，那效果就真的是好看。

他的背景是一段废弃了的河段，大概废弃得太久了，荒草就长得疯，又因为水的充盈，荒草弥漫的河沟里会夹杂着几支荷花，荷花本是精致脱俗的物什，却也会在这乡野里安然而生，颇有君子之风。还有柳，在乡野的岸边恣





王戈/摄

意地长，恣意了却也有模有样，绝不青面獠牙，恣意无态，很配合地随和着它的背景。水是静默的，废弃了，就更是静得荒凉出一种“野寂无人”的气氛。这样的气氛里，那老人洪亮了嗓子，一张口是一句“池里荷花风摆开，风摆荷花满池红”，这句子的妖娆文气配合了这样的场景是会让人一激灵的，下一句却是叙事了——“甲马营中传太子，一母所生两条龙。大龙名讳赵匡胤，二龙就叫赵匡胤。

兄弟俩，打罢关西闯关东。”这样的有历史演义味道的词儿，被老人富有节奏地道出，一句赶着一句，每一个节拍后都配了众声的“嗨呦”，就像了说古。运河的号子里，说古的内容是占着很大篇幅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十二月歌》——

正月里，正月正，白马银枪小罗成
一十二岁登州打，夜打登州救秦琼

二月里，天气活，陈琳救主抱双盒
娘娘拷打寇成玉，陈琳一旁无奈何

三月里，三月三，历山老母下高山
下山带来灵丹药，搭救徒儿薛丁山
……

听到这样的号子是让人觉得有点意思的，唱词的文雅，英雄的崇拜情结，让人觉得这哪像了劳动，这简直是娱乐。又一想，这种娱乐感，这种能“化劳动为娱乐”的号子内容里，其实是有着深一层的内涵的。

因为想来，号子本多是即兴而赋，本不要求有什么道理，唱号子的人也就是芸芸众生里的粗人，并不是什么文人雅士，而随口喊出的号子里都会有模有样——有戏文风韵，有故事素质，有章有法，又懂得赋比兴，就真是文化！就可见这是多么有文化的地方，就可见文化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而成为了常态。

的确，北运河的沿岸，多是崇文的地方，人长得人高马大，器宇轩昂，骨子里却在追求一种文气，这效果就很好看，这种好看在一首流传很广的号子里就体现出一种鲜明，词儿是这样的——

石榴树上鹦哥叫，叫得为奴泪交流。



泪交流来泪交流，姊妹三人梳油头。
大姐梳得盘龙髻，二姐梳得盖花楼。
剩下三姐没法梳，梳了个狮子滚绣球。
绣球滚到东海岸，拦住海水水倒流。
水转千遭归大海，磨转千遭归齐来。
井淘三遍吃甜水，人受教导武艺高。

这号子有一种轻松的好玩，北方文化，本是男性文化，本没有那么多的细腻精致，为赋新词，可惜就学得不像，就稚化成了一种憨态可掬。小女子的满腔心事，粗枝大叶的北方爷们会觉得莫名其妙，所以从那些文词里，学来的只是形式，歌词的末尾就生硬地转到教化上去了，有了一种说教的意味。北运河的文化里本来就是这样的气质——中规矩，懂文化，渗透进号子里，都是一腔的儒雅和文气。

另一首《日落西山黑了天》似乎更要无厘头一些——

日落西山黑了天，城门落锁上了栓。
走路的君子下了店，打渔的老汉把船湾。
大船湾到九江口，小船湾到漫沙滩。
打生之人下了山，下山打来金翅鸟。
打生之人被虎衔，猛虎掉到枯井里。
西北角下起了黄天。
大风刮过连山镇，枯井又被黄沙埋。

杀一命来偿一命，仇报仇来冤报冤。

这词的开头，有模有样，后来的叙事却旁杂杂，不知所云，恰是信口开河的无遮无拦，绕来绕去最后落到了戏文和道理上去，效果便突兀出了一份俏皮和滑稽。细一想，其实还是有章法，看似在说那个“打生之人”的背运，其实是在说着佛家因因果的道理，这又见着话本意味了。

其实从功用上来说，在这些劳动号子里，语词不见得是必须，必须的是节拍，而运河号子，在节拍的整然有序上又迎合了语词的内涵丰富，动作的整齐划一，以至情绪的昂扬激荡，这样的场面，是波涛的浪头滚滚，是山风的萧萧而鸣，是云朵的层层叠叠；这样的场面，让那些劳动着的每一个个体，抽象成一个音符或一个节奏，劳动的律动感成就情绪的昂扬激荡。让艰辛的劳动升华成一场狂欢的娱乐，让苦涩的生计转换成一种审美的过程，运河号子，就这样以一种有内容的形式，使生存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里晴日朗朗——欢乐、豪情、阳刚，和温暖。

听到这样的号子不被感染才是很奇怪的事。就有一些围观者也掺合进来了，他们围着这个领号的老者，很默契地做出一系列的动作，同时，配合着动作与节拍，呼出“嗨吆嗨吆”的和音。于是领音清亮，和音着实；领音叙事，和音抒情；领音突兀，和音烘托。呼尔嗨哟——我呼你嗨，我应你答，这才是真正的嗨歌——让身体的能量淋漓尽致地释放，这才是真正的劳动的本质与本色。

这样的号子与这些不惜力气的北方汉子相容在一起，那劳动才真是劳动，那劳动才有了

一种淋漓尽致。看北方汉子劳动本来就是一件很酣畅的事情，若是有过南方生活的经历，见过那些南方男人劳动时的心不在焉，有气无力，惜力如金的，就更会觉得北方汉子的实诚，他们不惜力气，不偷奸，不磨滑；他们为人豪爽仗义，快意恩仇。他们体质上孔武有力，心性上又好文尚武，这是一种在儒家文化里浸染过的人们才会有风貌，这是一种被运河的水气滋养过的生活才会有状态。

是的，想来，正是长期的儒家文化的浸染，让他们的生活态度里有着一份理性的智慧，让他们的行为里多了一些单纯的踏实。运河的纤夫号子里有很好听的一首，唱的是“春天吃的是秋天秋天的饭吆喂，冬天穿的是那夏天夏天的衫吆喂。日子嘛总得总得过吆喂，吃了么还要还要穿吆喂。”这说的是对生活的坦然，下一句是“哪有那过不去的过不去的坎哟喂，哪有那爬不过的爬不过的山哟喂。”这里又有豁达了。正是这样的，在他们的理解里，出苦力讨生活，换来食物和衣衫本是那么天经地义。而这种颇有理性色彩和励志倾向的教化，使他们的行为具有了规整的特点，使他们的状态处于平和的状态，于是在这里，劳动不会苦大仇深，生活不会怨天尤人，劳动的辛苦里，有了一份心甘情愿。这样的一种通情理，发而为声，那号子里说着的其实是顺天命勤努力的生活哲学。

还有运河的水。运河本是人工河，它顺地脉，巧连接，自自然然地连缀而成。它不会凶险，不会咆哮，不会烈性，它的脾性滋养着河岸上的运河文化，就有一种古意盎然的温文尔雅。这份文雅渗透进骨子里，所以它不会铿锵，

不会争斗。相反，它有的是一种市井文化的遣玩意味，也因为有了这点意味，那号子的腔调便古意盎然地有了戏曲化倾向。

北方人吐字，多字正腔圆，音调踏实，不会有虚词缠绕，效果便是干脆利索，清楚明白。

“开船喽！”首句绝不会粘连出很多虚词，拖音也只是拖在尾部，就很清亮利落，简练而不铺张。接着就是“嗨吆嗨吆”的帮腔，那些“嗨吆嗨吆”是低沉而浑厚着的，又因为人员之众，就造成一种黑云压城的效果了。而那个清亮的领号声，被这衬音一托，就更如一道金光闪过的明亮。于是一明一暗，一阳一阴，一应一答。也急，急也急得不燥；也缓，缓也缓得从容。

就这样配合了来，天然、从容、优雅，它不是在宣泄斗天斗地的豪情，它是在天地人的和谐中寻得一份自如；它不是在张扬一种自我，它是在一种付出的过程中求得一份快乐。这样的徐缓有度尊卑有序就使它产生出一种古意的雍容，这份雍容配了大船的宏气豪华，配了船上的皇家米粮，配了皇城的富足贵气，就具有了格局气象，是大格局，是盛世气象。

眼前，这种格局气象渗透沉淀在这河边老人的气质里，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历经岁月沉浮依然葆有的一份神气神采，心胸豁达，并由此成就出的虎虎生气。

是的，当年这些运河上的风景风情，化音





为声，绘形为影，渔舟唱晚，桨声灯影，肖声肖形，化而为意。这时光里便有生活的热气腾腾，生计的挥汗如雨，沉淀于时光的那段，看去，恰是风景。

而那些临河而歌的运河号子，因为它的气定神闲，因为它的通达通透，因为它的文化意蕴，还有它的腔调悠然，可以被称为是清调。

如今，那个桨声灯影的运河尚存，而那些有着高高的篷帆，长长的桅杆，迎着风，顺着水，神神气气的南来北往的大木船已悄然而逝。还有运河号子，离开了那条热闹的人声喧噪的运河，就失去了它的附体，而没有了号子的运河，少了灵气，像是一个孤独寂寞暮气沉沉的老人。而人们不管怎么努力，那种日子和场景是留不住

的，就像一本《诗经》，留下的是干涩的花，至于那些活生生的场景，那些情感，那些温度，那些文化，是留不住的，是终将要逝去的。

我们在怀念这些在生活里曾经出现却已然消逝或终将消逝的事物时，实际上，在心底，我们是在切切地寻找一种熟悉的气息，与伴随着这气息而来的有温度的生活。

而更行更远，我们会走向哪？我们只能在这临河而歌的清调之中，听到过去，体会惆怅，而消逝的事物，一如那些号子，一如那些声音，一如那些光影，无影，亦无形迹。

恰是逝者如斯的那一声叹惋呵，号子声声…… ■

运河风情

CANAL STYLE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
西风过眼水长东

近代日本汉学家笔下的 京杭大运河江苏段

撰文 | 孙宗广

月落乌啼惊客魂，
乾坤犹有一诗存。
古钟声断新钟续，
夜半江枫渔火村。



内藤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1899年10月25日，他乘坐客船经大运河进入苏州，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旅行。这一周里他造访或途经的主要景点有：宝带桥、吴门桥、胥门、阊门、虎丘、寒山寺、枫桥、留园、灵岩山、承天寺、北寺、玄妙观、孔庙、沧浪亭等。

内藤的苏州之行几乎都是借助画舫来完成的。他乘船由吴门桥到虎丘：“二十七日，画舫在吴门桥下解缆，先去虎丘。画舫沿着位于城墙西南、紧挨城墙外侧流过大运河行进，河中船舶穿行不息……过了胥门、阊门这些雅致名字的城门外，向左拐，进入稍微狭窄的水

路……到了虎丘山麓，民家稍微稀疏了一些。我们把船系在柳荫下上山。”可以看出，运河、内水互通为他的出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水城风光尽收眼底。

活跃于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股野琢，其《苇杭游记》是1908年经朝鲜到中国游历时见闻的记录。股野琢11月1日抵达苏州，4日赶往杭州，三天多的时间游览了玄妙观、北寺塔、开元寺、寒山寺、虎丘、锦带桥（即宝带桥）、伍子胥墓等处。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与感受，语言虽然简略，有时还诗文并陈，饶有趣味。总体来看，股野琢的日记所记简略，泛泛而谈，倒是他写枫桥的两首诗，要比他的



寒山寺

虎丘

枫桥



日记深刻得多：“月落乌啼惊客魂，乾坤犹有一诗存。古钟声断新钟续，夜半江枫渔火村。”“词客愁眠竟不浓，依稀渔火说遗踪。霜天落月枫桥晓，千古敲余山寺钟。”扬州、镇江次之。

宇野哲人，日本中国哲学史研究权威。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中国哲学史——近世儒学》《中国哲学概论》《中庸新释》等。《中国文明记》（1918）的纪行部分是作者1906—1907年间游历了华北、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写下的系列游记。其中他的镇江、扬州游记除了描述两地的风景名胜，均有与大运河有关的内容。他认为“运河对后人之裨益甚大，而万里长城仅是稀世之伟观，除好事者对之叹称外，实是无用之长物，两者到底难以同日而语。”的确有其道理。

至于扬州，“直至最近，扬州因当运河之冲，船舶辐辏，为货物之一大集散之地，繁荣至极。而太平天国后，中心移往苏州，扬州则一蹶不振。”则写出“昔闻扬州鹤，今移在苏州”盛衰变迁。德富苏峰是以《扬州一日记》为题记述他1917年的扬州、镇江之旅的。他乘坐小蒸汽船驶入他所称的“淮南运河”，实际是大运河江苏段的一部分。他从金山寺的高塔远眺扬州，写下一首诗：“六朝金粉水悠悠，南北风云今亦愁。独立金山寺边望，淡烟一抹是扬州。”颇有唐风气象。

晚清、民国年间，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需要，中国古籍流入日本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当然，正如学者钱婉约所言：“这里讨论的下限定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因为

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抢劫掠夺的野蛮行径，已远不是访书，不能属于和平时代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书籍文化交流的范畴。”

出于对中华文化的醉心与迷恋，近代日本汉学家沿运河南北访书求问，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作为汉学家的文化取向，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都城发展由黄河时代向运河时代转移之后，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进行了新的布局与调整。因此，冈千仞、内藤湖南等大学者的访书自不必说。即如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图书学家”的长泽规矩也（1902-1980）会“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非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真籍善本。”

高仓正三在抗战初期，也在苏州、上海访

书购书，“主要搜求话本小说、弹词唱本、唱片等。遇到有价值的廉价古籍珍本当然也不会放过。”除了访书购书，他们还热衷于访师结友。比如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游历中国111天、近万里路程，最终有《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问世。这一既有日记、又有诗作的纪行，有实录有感发，诗文并茂，是一部有较高价值的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的游记。竹添在上海期间，曾携家眷游历苏杭，并亲自到诂经精舍拜访心慕已久的朴学大师俞樾。因当时俞樾已回苏州，他又赶往苏州春在堂与俞会面笔谈。

竹添进一郎有汉文诗《廿七日过吴江县》《过黄泾，距洞庭山可廿里》《是夜泊铜村》《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屡至（惠山一名九龙山）》《廿八日抵苏州，泊阊门外。雨大至，

赋似内人》等几首，可谓高度概括了竹添在苏州段运河的旅途心迹。

冈千仞，精通汉学与西学，1884年6月下旬，冈千仞自昆山乘船进入苏州，观娄门、阊门、胥门、留园、怡园、沧浪亭、寒山寺、狮子林、圆妙观（玄妙观）、吴门桥、觅渡桥等景观，访问李鸿裔、俞樾、顾文彬等名人，逗留一周有余。他的《观光纪游》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而视“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的吉川幸次郎，他在北京留学期间，曾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幼渔、朱稀祖、钱玄同、沈兼士以及陈垣、余嘉锡、吴承仕、伦明等人的课程，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季刚）、吴梅（瞿安）等先生问学。”而他的《高邮旧梦》，则记述

了他1931年从扬州沿运河北上，去高邮寻访古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等高邮名人故居的过程。在他笔下，高邮的自然风光很美：“……出得城墙，就看到大运河中河水荡漾，泛着茶色。在它的对面，高邮湖的水却呈现清冷冷的光洁，远远地闪烁在遥望的视线中。”而激发他想要了解高邮的，却是渔洋山人王士禛以及高邮词人秦观等。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熟谙、痴迷令人敬佩甚至惭愧。

近代期间的西方社会，总体是以蔑视、嘲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即使从感情上热爱中国文化的近代日本汉学家，也无法完全超越时代的歧见，更无法摆脱掉民族、国家利益的本位主义。正如学者张明杰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

枫桥





留园



天平山

吴门桥

扩张政策相关，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所以，宇野哲人的苏州游记包括日本租界、沧浪亭、吴门三百九十桥、玄妙观、北寺塔、留园、枫桥、寒山寺、虎丘、灵岩山等十节文字，游记以日本租界开篇，作者即感叹苏州租界之荒废：“千辛万苦获得之租界，若仅作赏花游水之，未免太可惜。呜呼！谁之罪也。”

需要指出的是，宇野哲人为学严谨、处事温厚，素有中国儒家之风，但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未曾有些许对于侵略我国的悔恨与负疚感，这是日本朝野较为普遍的精神取向。德富苏峰被称为“日本的梁启超”，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德富苏峰两次来苏州，逗留时间都不算长，均有文字记录，1917年第二次游苏记录较为详细。他于初冬时节先后去

往虎丘、天平山、寒山寺、留园、宝带桥等处，次日子夜一点多乘车离去。此行在苏峰笔下，有“完全荒废”的虎丘，也有世所罕见的宝带桥；有天平山上满山的黄叶，也有大运河上夕阳斜照的清波；有范公祠里堆满牧草、谷子的农家小院，也有留园中铺张的盛宣怀殡葬仪式。例如：“虎丘千载塔尖孤，宝带长桥似画图。一水回环行不及，月明如故过姑苏。”诗味隽永，有恋恋不舍意。须知，他可是日本右翼思想家典型，其思想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折射，当今日本右翼思潮和政界的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游历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陆续成文，最终汇集成《中国游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芥川在苏州参观了北寺塔、玄妙观、文庙、天平山、灵岩山、寒山寺、虎丘、留园等景点。

1921年的中国是一个满目疮痍、处于内忧

外患、大部分国人一味沉睡的中国，那些不文明的人与事，让他感到极其厌恶，这其中自然包括充斥着蝙蝠粪臭的苏州文庙、显得荒凉的佛堂、荒废的虎丘……与此同时，喧闹的街市、长满芎萝与野草的瑞光塔、建筑整体宏大的留园、充满诗意的苏州水……又让芥川对于姑苏城生出“优美的心境”。

必须说明的是，芥川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他的苏州游记也折射出复杂而深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忧患意识。如面对着荒废的文庙，他思绪万千：“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

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

所谓“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

同样的，芥川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

近代日本汉学家的记述同国内史志一样均增添了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厚度。这些汉学家谙

熟汉语史籍，充分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即使部分作者在政治上歧视中国与中国人，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抱有一种诚恳好学的态度。

实际上甲午后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人并不算多，可是在访学时涉及的领域却非常广泛。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前文已提及，而武内义雄（1886—1966）既潜心于“燕京读书”，又发誓走万里路，遍读了中国南部的名胜遗迹和古碑墓刻。

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与化解。但“他们本着对学术的真挚追求，超越战争政治的阴影，为了一份绝大多数人尚还无法理解的专门课题，远赴中国，忘我地潜心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我们在阅读近代日本汉学家的江苏段运河游记时，除了体会文中所勾画出特定时代的运河城乡风貌，还要对他们总体上表现出的学者的认真与严谨奉献出一份敬意，并期待中日文化之间的交流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

西风过眼水长东

——1949 年之前欧美人士眼中的京杭大运河苏州段

撰文 | 孙宗广

马可·波罗 (1254—1324 年)

世界著名旅行家，17 岁时随父辈自家乡启程，沿古丝绸之路东行，于 1275 年到达中国，得到元世祖忽必烈信任，从此留居中国达 17 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曾奉使访问过江南、云南等地，游历几遍中国。

元至元二十年（1283 年）前后，马可·波罗到苏城，盛赞苏州物产富庶和文化昌明：“苏州（Sugui）是一颇为名贵之大城……特商工为活。产丝甚饶，以织金锦及其他织物。其城甚大，周围有六十哩，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此城有桥六千，皆用石建，桥甚高，其下可行船，

甚至两船可以并行。……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良城也。此城名称苏州，法兰西语犹言‘地’，而其邻近一别城行在（Quinsay），则犹言‘天’，因其繁华，故有是名。”

利玛窦 (1552—1610 年)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因病卒于北京。

利玛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皇帝允许安葬于中国领土的外国人。1598 年沿运河南下的利玛窦因身染疾病，到苏州投奔老朋友瞿汝夔（即瞿太素）。利玛窦如是说：“这里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像威尼斯人那样；但



是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

街市和桥都支撑在深深插入水中的独木柱子上，像欧洲的式样。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从陆路进城只有一个入口，但从水路进城则有好几个入口。城内到处是桥，虽很古老但建筑美丽，横跨狭窄运河上面的桥都是简单的拱形。”

尼·斯·米列斯库 (1636—1708 年)

罗马尼亚人，曾于 1675 年出任沙俄使节，

次年在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1678 年返回莫斯科，归国后撰写《中国漫记》等书。该书涉猎甚广，对我们从特定角度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米列斯库这样评价苏州：“本省第三大城市为苏州府（Suheu），这是中国著名的富裕城市，中国人称之为‘人间天堂’，这是因为其富裕、秀丽无可比拟。……整个城市都建在水上，和威尼斯一样，但是这个中国城市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因为这里的水为淡水，可以随便饮用。因此，这里的石拱桥不计其数。为避免泥泞和潮湿，所有的房屋都是架空的，房子建在支柱上。

全城到处都是宽宽的河道，大船可以随意通行。从这里到出海口只有三天的航程。城市





离太湖不远，太湖上集中有大量船只和货物。

全城方圆四十华里，约相当于十四俄里多，连同郊区超过三十六俄里。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和娱乐用品，这里都应有尽有。这个地区是全中国的著名地区，因为印度、葡萄牙、日本等各国商人都在这里将中国货装上船，运回他们国内；中国人也从这里出发，驶往世界各国。……”

李明（1655—1728年）

法国人，耶稣会传教士。1684年受法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传教，直至1691年，李明才回到法国任耶稣会长老。其后李明在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

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在《中国近事报道》一书中，李明用较多文字介绍了苏州，全书按照书信分十四章，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详尽的报道。其中，有关苏州的文字在第三封信《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中，部分引述如下：“沿着杭州大运河前进，您就会到达离杭州不远的苏州。中国人估计城周四十里，事实上它的面积大得惊人。这里设总督，是帝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与我上面所谈城市相比，我不认为它的人口那么稠密；但是，它的市郊以及各条运河上往来穿梭的难以计数的船只，实在令初见者叹为观止。当您耐下性子，在船上待一阵，



静观来自四面八方到此买进卖出的人们的嘈杂、拥挤，您会认为整个王朝都是靠这里供应的。

而那些海关的官员们，尽管不算严格，也是忙于收缴关税，不仅从无一时闲暇，而且常常不得不把一些商人安排到翌日，以便打发先来的货主。”

乔治·马戛尔尼勋爵（1737 - 1806 年）

英国资深外交官，1792 年他作为英国政府委任的访华全权特使，与副使兼秘书斯当东爵士等人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 700 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等五艘船只，以贺乾隆帝

80 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

马戛尔尼及其随员乘船沿大运河南下返国，在夜色中与苏州城擦肩而过，仅对宝带桥印象深刻：“……已而又过三小湖乃互相毗连者，其旁有一长桥，环洞之多，几及一百，奇观也！”

倒是运河沿岸景色令随行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目不暇接，沿途他与中国人的接触也激发了创作的灵感。

他兴奋而忙碌地画下了许多有关大运河上生活的速写，后来有一些被重新绘制成精彩的水粉画。“大运河的苏州段”便是其中一幅。



马戛尔尼等人亲身体验中国经济上的贫困和清廷政治上的专制、黑暗和野蛮，此前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因而荡然无存，他们后来成为主张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戛尔尼等的记述要比《南京条约》更早从文化层面上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页。

詹姆斯·利卡尔顿（1844—1929 年）

美国摄影师、教师、旅行家、发明家。1900 年，他来到因义和团事件而成为世界焦点的中国，从香港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拍下大量

的照片，并怀着对中国的好奇、热爱、痛恨、怜悯和同情，为所拍摄的照片做了详细记录。

在他有关苏州的照片中，《当地人用训练过的鱼鹰在大运河里捕鱼》聚焦于苏州人捕鱼的生活场景，是水乡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儒家文化下的如画风景——苏州的运河和吴门桥》中，那些沿河洗衣物的穿长衫妇女，那些撑着小船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的船夫，以及在桥面上走过的黑的身影，无疑都折射着历史的底影。他撰文说：“这个地方曾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血腥战场。戈登（Gordon）的军队在运河对岸稍远的地方，太平军在这一边，有 20 万人。而现在，

靠近我们这一侧的河边，几名妇女正聚在一起洗衣服，另外几个在淘米。全都在同个地点同一条河里（吃喝这严重污染的水似乎也没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这些妇女都是底层的、从事体力劳动的穷苦人。”

寥寥数语，道尽沧桑，昔日血雨腥风，今日风平浪静，在这浣衣淘米的平和背后，似乎依稀可见那刀光剑影，令人感动的却是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1860—1925年)

英国画家，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擅长油画和水彩风景，1907年来华，集画面与文字的《帝国丽影》是记录此行的成果。该书第九章以《苏州与太湖》为题，记述了作者畅游苏州及太湖区域木渎、光福等水乡古镇的过程。在作者笔下，既有“太湖光福”“光福石桥”“苏州木渎”“鸬鹚渔船”等油画，也有精炼与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作为运河城市苏州的独特一面。

他这样写道：“回程的路线大致相同。将所有景物重温一遍一样让人兴奋，似乎还更有乐趣。特别吸引我的是小村庄温塘里的一座桥。桥跨运河而建，桥上有一座别致的古老神庙。我画了张它的素描，前景是几艘鸬鹚渔船。”

同样的，“苏州吴门桥是大运河上最精美的桥梁之一。它是由齐整的青石砌成，高高的桥拱优雅地掠过河面。……城内街道逼仄，有不错的店铺和照例熙熙攘攘的人群。”

威廉·埃德加·盖洛(1865—1925年)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他的《中国十八省府》(1911)用近

两万字（兼有部分照片）介绍了作为江苏省省府苏州的悠久历史、城市建筑、水路交通、名胜古迹等。

文字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坐船游苏州”以亲历为基础，全面而清晰地论及苏州发达的运河、失于管理的下水道和以宝带桥为代表的拱桥等，显示作者对苏州运河系统及城市建设的充分认知。

卫礼贤(1873—1930年)

德国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9年卫礼贤来到刚刚成为德国租借地的青岛，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他兴办学校、医院及其他各种慈善事业，创办报刊、编纂教科书，同时勤于笔耕，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心灵》《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著作。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中学西播”的一位功臣。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可谓积贫积弱，但此时的苏州在卫礼贤笔下却富有诗意，朴实、宁静、和谐、优美、节奏缓慢、生活幸福，恍若人间仙境。

他的苏州游记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我们在运河上的航行非常愉快。太阳出来了，河道上波光粼粼，船上的中国朋友在甲板上说说笑笑。我们经过广阔的田畴，穿过跨在绿树成荫的两岸间拱形的小桥。

时不时地还登上岸边，看着小山中丛林掩映的寺庙，或在河边闹市中浏览一番。运河沿路上有一排排捕鱼的小船，在这些小船的边上又排列着一列列鸬鹚。……” ■

运河史话

CANAL LEGEND



京杭大运河名称考
运河拱墅段后申遗时代建设的思考



京杭大运河名称考

撰文 | 顾丽娟

京杭大运河，春秋时期吴国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以洛阳为中心，连接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自江南到洛阳的陆上水道；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弃“弓”走“弦”改造南北大运河，全长约 1800 千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江苏、浙江 7 个省市，沟

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起周边 20 多座城市。历来对运河、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名称的由来关注不多。

本文对京杭大运河及与这一名称相关的信息进行梳理，试图廓清运河名称发展变化的来龙去脉，同时提出嘉兴地方文献在运河名称记载中的作用。

据《二十五史》的本记、沟洫志、河渠志、地理志和食货志等及有关典籍记载，我国古代对天然河道多称水，《尔雅·释水》对（长）江、（黄）河、淮、济独流入海的四条大川，称四渎，除了黄河，都称“水”。《水经注》详细记述我国的大江大河等大水系，在全书中，很少见到“河”字，即使像黄河，也以“河水”来记述。

因此，我国古代对河道的命名，大致对自然河道，以“水”命名，比如嘉兴古代的河道有“长水”之名；而人工疏浚开挖整治的河道则多以“沟”“渠”命名，如鸿沟、邗沟、郑国渠、灵渠、永济渠、通济渠等，江南地区也有以塘命名的，如嘉兴的海盐塘等。

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所开的支线运河也多称“渠”，如武后垂拱四年在淮安境内的涟水开新漕渠（今涟水通连云港的盐河），

“南通淮，北达海、沂、密等州”。所以，直至宋初，漕运的河道，仍多称“渠”。

我国最早的运河和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体系无关。有关运河开挖，从史籍记载看，开始于春秋吴国时期，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宰相）公孙敖主持开凿“鸿沟”，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为晋楚争霸开挖。后吴王阖闾和夫差为了向西征讨楚国，向南攻打越国，北边则是为了争霸中原，而在江南地区大规模疏浚开挖河道，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河道疏浚开挖活动，先后开挖疏浚了“堰渎、胥浦、古江南运河、百尺渎、邗沟和荷水”等6条河道。主要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这一河道疏浚开挖，不同于当时中原地区兴修水利工程主要为了解决灌溉问题。此后秦开凿灵渠，也是军事目的。

在秦灭亡后很长时间，由于统一的汉帝国内基本和平，因此运河的军事需要不明显，再加上当时北方对南方经济上没有依赖，运河基本处于区域运行状态，除小规模疏浚开挖，没有成为政府要务，这一局面直到隋炀帝时代才终结。

此前在隋朝平定南陈后，借口所谓金陵有“王气”，在攻占南京（当时建康）后，隋文帝杨坚下令平毁了开挖于三国时期的运河“破冈渎”。到了隋炀帝时代，出于军事和出巡的需要，开始大规模疏浚开挖河道。其中关于满足他出巡需要的动机，近年来虽然颇受质疑，但此言大致不谬。隋政府先后动用数百万人工，完成了如今称为隋朝大运河的工程。以军事为运河修建目的直至唐代才有根本改变。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明清两代视运河为维系国运的要

务——对南方粮食的依赖，迫使他们不断疏浚开挖运河，确保其畅通。因此这一贯穿南北的水道才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漕河。

明代的运河北自大通桥，南迄杭州，分别由大通河、白漕、卫漕、闸漕、河槽、湖漕、江漕和浙漕组成。其中的江漕和浙漕即原来的江南河，全长1500余千米。我们现在描述的大运河形象，大致就是从当时开始的形象。由此可见，在南北水道的认识上唐代是个分水岭，从唐代开始，运河丧失了军事功能，而转为为维护统治稳定提供经济保障的水上通道，越来越与民生相关。

从明代开始，运河畔开始兴起商业贸易集镇，成为伴运河而兴、而荣的运河城市带，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故明清时期南北大运河主要用于南粮北运的漕运，因此，明代统一的南北大运河被称为漕河，而不是运河，清代沿用。

至于晚唐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其一》：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恰恰说明水上粮食贸易运输并非隋炀帝开挖运河的目的。

二

关于运河之名，有学者考证直到宋代才出现，是江苏境内的龟山运河。据《宋史·河渠志》载，雍熙初，“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元



丰六年正月，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元丰）初，发运使许元自淮阴开新河，属之洪泽，凡四十九里”。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在淮安境内的淮河右岸，先后开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

也就是说，直到北宋元丰初年，在史籍上才第一次出现“运河”一词。元至元年间，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使运河在山东境内裁弯取直，从此，运河在淮安的清口转向，沿黄河（古泗水）北上，不再向西绕经河南省的黄河，运河基本上呈南北走向，缩短了航程。

关于大运河名称的由来，有人认为元代应

称其为京杭大运河。但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元代的都城称大都（即今北京市），并不称北京。明初，改元朝的大都为北平府，永乐初改顺天府，永乐十八年，朱棣迁都北平后，改北平为北京。

也就是说，明永乐十八年（1420）始称北京，所以说，元代的大运河，与北京并攀不上亲缘关系，还只能称“大运河”，或称“南北大运河”，也不能称为“京杭大运河”。

明永乐虽然改北平为北京，可是，在明代习惯上多称运河为“漕渠”，如：江南运河称“浙漕”，湖广的漕粮多顺长江而下，称长江为“江



漕”，淮扬运河因多串联湖泊而成，称“湖漕”，过清口，直至徐州以黄河为运道，这一段称“河漕”，山东段运河地势较高，济宁附近的南旺有运河屋脊之称，在“屋脊”两侧节制闸坝数量较多，故称闸漕；临清至天津直沽段的运河，多为卫河下游河道，称卫漕，直沽至通州，为古白河的下游河段，称白漕。此外，清代，在江南河道总督署辖区范围的河道，称黄河为外河，淮扬运河为里河。康熙中，河道总督靳辅开骆马湖至清口的中河，因其位于黄河的遥、缕二堤中间，故名中河。在河道的名称中，仍较少冠以“运”字。

据学者范成泰考证，京杭大运河的名称，应该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而大运河一名首先出现在江苏淮阴（今淮安）一家烟草企业生产的香烟包装上。1958 年初，当时江苏淮阴（今淮安）地方国营的淮阴卷烟厂（原国营华新烟厂），生产试销“大运河牌”香烟，其外包装除了“大运河”三个大字外，上方的图案是北京天安门，下方的图案是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隐含“京杭”之意。可以理解为“京

杭大运河”名称的发端。据说，1959 年 7 月，该品牌香烟正式上市，非常畅销，深受普通烟民们的欢迎，一时声名大震。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又相继投产了题为“东方奇景——京杭大运河”系列品牌香烟，在烟标上分别印出了沿运河主要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风景名胜，如：天坛胜景（北京）、洪泽夕照（原淮阴今安的洪泽湖）、烟花三月（扬州）、金山朝晖（镇江）、鼋渚春涛（无锡）、虎丘剑池（苏州）、三潭映月（杭州）等，这一品牌香烟占据苏北主要市场 30 多年。同时在 1958 年，江苏省开始全面整治大运河，机构名称是“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印章与机构名称相同，各地区也都是“江苏省某某地区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印章也都同用“江苏省某某地区大运河工程指挥部”，但没有正式称京杭大运河。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9 年秋，江苏省淮阴地区大运河工程指挥部上报治理大运河的一个工程项目，文件中标题也有称“京杭运河某某工程”的名称出现。

所以说，京杭运河的名称，最早出现在淮安，来源于淮安，是有依据的。

运河沿岸地区，伴随运河的真正步入经济大动脉时代的进程，不断发展演进，自唐代以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生产进步，文化兴盛，成为当时的发达地区。这一点运河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样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滋养了运河文化的丰厚积淀。由运河而大运河，进而京杭大运河。这一名称的演进，可以看到运河文明发展演进的脚步，也构成了运河文明的一大核心。■



运河拱墅段后申遗时代建设的思考

撰文 | 石永民

一、拱墅区文化遗址概况

京杭大运河在蜿蜒中沉淀历史，见证着沧桑变迁，是流动的文化。拱墅两岸 12 公里运河的古老风貌中，众多的闸、塘、坝、码头等历史文化遗存，熠熠生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运河水工、人文遗址群落，成为杭州拱墅历史宝库中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变迁，城市大规模改造，河道拓宽、延伸、填埋等原因，很多遗址正渐行渐远，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拱

墅运河著名的三塘五坝之一，大名鼎鼎的德胜坝，自元代以来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一直是京杭运河南终点的象征，周边码头、仓库众多。当年，船只翻坝，货物过塘时，曾经人声鼎沸、惊心动魄，日夜繁忙。后因运河延伸，横卧于河中的德胜坝被拆除，东岸仅存的德胜坝巷后来也被拆迁，若大个德胜坝码头从此凋敝破败，埋没于杂草丛中，周边码头上大片露天仓库后被改建成左家新村等住宅小区。德胜坝南侧的



清河闸上中下三闸建于宋代，是杭州钱塘江经龙山河、中东河沟通运河的复式船闸。但该三闸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浣沙河填埋后，三闸俱废，仅留下清河闸弄巷名。而同时代、同式样的复式船闸海宁长安闸，因保存至今，且代表了当时水利航运设施建设的国际先进水平而被列入世界遗产点。相比之下，清河三闸的遭遇令人扼腕痛惜。其它如猪圈坝等经历了炼油厂建厂、拆迁，再到建设华浙广场等过程变迁，也已变成荒芜的墟丘。衣锦桥下古纤道是上塘河千年漕运见证，现沉浮于水中。代表花朝节文化的祥符花神庙早已拆毁消失。清代旅日琴僧东皋心越是一位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位于半山的上塔伏虎禅院是东皋心越

禅师嗣法之地，后东皋心越成为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的第 35 代传人，故此地也成为日本曹洞宗寿昌派的祖庭。但该寺院 1970 年被拆除，仅剩荒冢一堆。上述古文化遗址历经沧桑，最终仍荡然无存，令人惋惜。如今，已被人们淡忘，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址，当文物普查员上门登记时甚至有些居民及社区人员对辖区内的上述曾名声响当当的文化遗址全然不知其所云。究其原因：

一是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和开发两者之间处理不当；

二是环境恶化，水质污染、空气污染、酸雨、随意向河道倾倒垃圾造成淤塞并日积月累地腐蚀遗址；

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传统文化的迷失；
四是人们受老观念影响，认为千年的桥栏杆当不了古董卖，没啥价值，对该类桥坝闸码头等遗址的损毁现象无动于衷。

鉴于此，运河沿岸部分历史文脉已漫漶不清，几经湮灭，挖掘、保护和抢救刻不容缓。

二、拱墅文化遗址的挖掘保护

拱墅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多次主持召开相关会议研究、部署保护措施，启动文化遗存的挖掘、保护展示工作。区文化部门和相关街道对挖掘和保护文化遗址也形成了共识。大家感到，这些文化遗址不仅是今人追寻运河历史的窗口，更是传承爱国主义和城市精神的课堂，如果我们漠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这座城市的记忆就会出现断层。从一定程度上说，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址就是留住我们这座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城市的记忆。

近年来，拱墅区在保护展示第一批十大历史文化遗址水田畝、战国墓、娘娘庙、善贤坝、北新关、荣华戏园、通益公纱厂、温元帅庙、陈重周故居、江墅铁路陈列馆的基础上，启动了拱墅第二批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传承项目，将其列为运河文化名区建设中推陈出新的工作。历时一年，对文化遗址现状、历史渊源和价值地位、自然、人文环境等进行普查，摸清了区域历史文化家底，为保护传承，为开发利用打下基础。各调研人员深入遗址现场，排查勘察，进行了田野调查、街巷寻访、知情老人访谈、林水部门咨询、地图与现场实物对照查证、文献典集查找、古图佐证、权威部门求教、反复

研究、比对、甄别挑选、公示征询意见，力争不留缺憾，使之成为隽永的历史纪念。

最后，通过省市文博、河道学及半山文化等专家组的论证，选定东皋心越嗣法之地等 13 项文化遗址及碑样式，它们分别是：

- (1) 东皋心越禅师嗣法之地——上塔伏虎禅院遗址；
- (2) 上塘河衣锦桥下古纤道遗址；
- (3) 和睦古桥；
- (4) 义桥码头；
- (5) 德胜坝遗址；
- (6) 猪圈坝遗址；
- (7) 新河坝遗址；
- (8) 石灰坝遗址；
- (9) 清河闸遗址；
- (10) 圣因接待寺遗址；
- (11) 卖鱼桥遗址；
- (12) 祥符花神庙遗址；
- (13) 同福泰官酱园旧址。

为扩大这些文化遗址的影响力，拱墅区还通过媒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宣传展示活动，彰显各文化遗址在历史、文保、水工科技等方面的价值。如位于湖墅南路北端，横跨余杭塘河上的卖鱼桥，因旧时为鱼市所在而得名。往来舟楫聚泊于此，米店、鱼行众多，商贾云集，集市兴盛，是十里银湖墅的中心。但该桥历经沧桑后桥面已成通衢大道。路人不明就里，常将运河上的江涨桥误认为卖鱼桥。如今在信义坊东广场恢复了卖鱼桥的历史旧址。现在的“卖鱼桥”不仅是单一的桥名，而是杭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区域名称。有许多古代建筑、名胜古迹和典故传说，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对研究杭州运河集市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等具有重要价值。

又如位于城北左家桥西的圣因接待寺遗址，初建于宋大观年间，规模宏大。寺主思净禅师乐善好施，接待宋室南迁之流寓僧俗人等无算。康熙皇帝南巡时，御书“圣因”两字，复赐御书心经一部、心经塔一轴，曾被奉为镇寺之宝，

后均堙灭。历史上接待寺废兴不一，然名僧辈出，曾有湖墅寺刹之冠的说法。此次，也在原址上树碑保护、展示。

再如位于老大关桥北紫荆街上的同福泰官酱园，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是杭州运河畔闻名遐迩的酱园品牌，也是民族手工作坊百年沧桑的缩影。1956年，酱园经公私合营后发展成杭州酒厂，现已拆迁为住宅用地。通过宣传展示，进一步扩大了运河遗产保护理念。现如今人们漫步运河之畔，移步换景，仿佛置身于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对于丰富运河世界遗产、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推进运河旅游，意义重大。

三、将运河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拳头产品的建议

遗产不仅需要保存与展示，也可以改造和利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能够创造现实的旅游价值。这些文物遗址和古迹都是形成城市历史的重要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拱墅运河旅游的灵魂。如何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拳头产品，创新走出一条打造运河旅游世界级产品的新路，我们建议如下：

1. 注重运河旅游联盟营销策划。运河文化是运河景区建设发展的驱动力，而文化遗址是其依托，有遗址就有该地的人文线索，就可寻觅民间传说和市井掌故，就可以勾勒蓝本，演绎传奇，延续人脉。应抓住京杭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旅游部门组成“京杭大运河城市旅游推广联盟”为契机，争创5A景区。要围绕运河文化进行深度旅游营销。适时推出运河沿线杭帮菜、淮扬菜、鲁菜、满汉全席等美食；推荐

杭扇、苏绣、鲁锦、杨柳青年画等各种旅游纪念品购物攻略，提供好飞机、铁路等交通信息。要注重旅游业与影视文化业的联姻，抓好类似《运河千古情》等大题材的创作；整合沿线越剧、评弹、昆曲、锡剧，淮剧、山东快书、河北梆子、京韵大鼓等地方戏曲资源，进行深化提炼，创新编排出运河名段、名角折子戏经典荟萃，力争一炮打响运河旅游演艺品牌。

2. 创意旅游经典线。策划将遗址串成一条“一埠二闸三塘四街五坝六馆七艺八景”的黄金珠链，打造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试行后推向旅游市场。

一埠：船泊卖鱼桥河埠码头，游富义仓、香积寺、仓基上园林泰斗陈重周故居，草营巷温元帅庙。银湖墅中心旅游开花。

二闸：南有三堡船闸，北有清河三闸，盈盈一水连古今，旧址新闸，带你将时空来穿越。

三塘：上塘河系古运河、下塘河称大运河、子塘河在古新河，三水相连可通舟，运河风情两岸现。

四街：从北到南有四街，恢复义桥老街、桥西历史街区、小河直街、大兜路历史街区，四街之间运河自然生态、民俗风情、人文景观，一应俱全。

五坝：大运河拱墅段著名的水工遗址“三塘五坝”，其中三塘为上塘河、下塘河、子塘河（古新河），五坝为德胜坝、石灰坝、新河坝、猪圈坝、会安坝（位于艮山门外）。知晓杭州古城水系，了解运河如何沟通西湖、西溪、钱江，叹城市之沧桑变迁。

六馆：游运河畔国家级博物馆群，即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刀剪刀博物馆、扇博物馆、伞



博物馆、工美术馆、非遗手工活态馆，知晓大运河前世今生，传承文明，生生不息。

七艺：游富义仓，品茶道、花道、禅道，观剑瓷视界，游太极柔道馆、行修楔事，游老开心茶馆听一段老杭州小热昏曲，不亦乐乎。

八景：神游湖墅八景，使之感慨于沧海桑田之变迁，发思古之幽情。

3. 开辟古新河水上观光线旅游。一路游览圣塘闸、沿河公园、古万物桥、在清水潭，开辟湖墅首刹——接待寺展览室，听接待鸣钟故事，别有一番情趣。

4. 制作“三塘五坝浮雕墙”。在德胜坝附近制作大型“三塘五坝浮雕墙”，真实再现各塘各坝、各水网水系流向、水位高差，各水工

遗存、水利设施、闸坝、斗门、纤道，各翻坝过船场景，各码头过塘行、货栈、仓库等，作为见证河道变迁的重要节点。

5. “重走百年江墅铁路”之游，探寻钱塘江与运河的陆上交接。江墅铁路的兴建，源自1906年11月，浙江汤寿潜等人发起了一场影响遍及全国的保路运动。后依靠民间集资自办铁路，浙江也因此有了第一条铁路。百年沧桑，绍兴路上曾经高耸的铁路路基已不复存在。但人们没有将它遗忘，如今，江墅铁路两端的闸口和拱宸桥相继建成铁路遗址公园，那曾经在江墅铁路上行驶过的蒸气火车头，从消失的空间拉回到真实的站台中来，唤回了人们的记忆。重走闸口、江墅铁路遗址公园一日之旅，探究



这条百年铁路建设的前因后果；了解一段运河与钱塘江铁路沟通的曲折历史；体验一把民国范儿的站台候车感受，留一张跟火车头的经典合影；再听一段惊心动魄的保路运动故事，爱国热情油然而生。

6. 涉水爬山，延伸上塘河水上巴士观光旅游线至半山。沿水上巴士线从京杭运河主通道拐入胜利河，再过船闸入上塘河，沿善贤坝水路，过欢喜永宁桥、皋亭坝，达半山衣锦桥。探究桥下古纤道之沧桑变迁；登岸，游半山娘娘庙；听蚕农讲蚕房避鼠之传说：鼠性多疑，鼠首两端，遇见双面泥猫栩栩如生，大赫，从此蚕房内老鼠绝迹，泥猫逐渐成为蚕农的镇鼠之宝。复登临半山上塔伏虎禅院遗址，瞻望由东皋心越开创的日本曹洞宗寿昌派祖庭，使该教化历史源远流长。亦可根据四季，另增春赏半山桃花；夏观立夏称重、吃乌米饭习俗；秋游半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冬品皋亭积雪之雅等旅游项目。届时，沿游步道上山，

登望宸阁，杭州美景一览无遗，岂不快哉。

7. 策划一河串百艺老街古镇一日游。老街为义桥老街，原系运河客运码头和蚕桑丝绸集散地，街市朝河一字排开，商铺繁多，人流摩肩接踵，生意兴隆，为当时的义桥乡中心。古镇为塘栖。建议在规划中恢复以义桥码头为中心的义桥老街非遗项目活态展示街区，前店后坊，使非遗传承有市面。

可策划引入船民习俗、运河花灯、鸬鸟鳌鱼灯、龙舟胜会等风俗及半山泥猫、天竺筷、灶头画、张小泉剪刀技艺等，进行保护、展示、传承，起到一河串起非遗百态的作用。可邀请运河边的原居民游义桥老街，吃美食、进茶馆、听曲艺、看非遗技艺，追求身临其境的体验，为运河故居游览注入人文情感和难以忘怀的记忆。建议以义桥老街拆迁整治为契机，打造古运河民俗风情一条街，统一规划，防止出现以绿化林带为主遮盖义桥老街遗址而过的憾事。■

运河遗存

CANAL PELIC



运河第一香
我心如秤
大运河水脊



京杭大运河南端，大兜路历史街区东侧，有一处佛教圣地——香积寺。

《武林梵志》记载，杭州香积寺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旧名兴福寺，后由宋真宗赐名“香积寺”。

在历史的长河中，香积寺几度兴替。老杭州人都知道，香积寺有“路”没“寺”，有“塔”没“殿”，已经非常破败——几段到处往下掉土的围墙，几乎已经看不出红漆的山门，还有门前的两座斑驳的老塔。后来，香积寺先后被一家机械厂、一家设备厂占用，“香积寺”也就渐渐淡出了老杭州人的视野。1968年，门前双塔中的东塔也被拆掉了，只剩下西塔，



默默地告诉世人这里曾经的辉煌。

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新香积寺的复建工程于2009年初正式启动。新香积寺按照“二十一世纪都市新寺庙”的目标，以五代吴越建筑风格为基础，以明清建筑风格为定制的历史定位，体现出半传统半文化的特色，努力再现“杭州运河第一香，湖墅市井风情地”的繁荣胜景。

2010年2月7日，新香积寺落成开放。新香积寺占地面积16855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13150平方米。复建了东塔，对原有的西塔进行了整修加固，“香积双塔”一景重现。

新香积寺从牌坊进入，依次为天王殿、大圣紧那罗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寺内两侧有观音殿、文殊殿、普贤殿、钟鼓楼等建筑，各类造像34尊。

新香积寺在中轴线上以“伽蓝七堂制”为依托，分别布置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并在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之间布置具有本寺特色的大圣紧那罗王殿。中轴线两侧分别按照“四大名山”的布置，于大雄宝殿前后两侧分别布置普贤殿、观音殿、文殊殿、地藏殿。



新香积寺复建工程借鉴了雷峰塔的成功经验，采用工程木、铜构件等新型材料，殿宇金碧辉煌，气势昂然。

2015年5月1日，新香积寺移交杭州市佛教协会，香积寺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目前杭州唯一一所在都市中心的寺院，新香积寺正以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为己任，在衍空法师的住持下，团结带领广大信教群众，发挥自身优势，继承、弘扬佛教优秀传统文化。

香积寺曾是京杭大运河上香火最

鼎盛的寺庙之一，香火旺盛的程度比肩灵隐寺。杭州、嘉兴和湖州，辖区大，人口也多，由于江浙地区水路发达的原因，香客都是坐船到这里上香。每年春秋两季，从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过来的善男信女，乘船循运河西行，过了拱宸桥即弃船登岸，虔诚匍匐于巍峨庄严的香积寺下。上罢头香后，善男信女在寺中品尝寺院斋饭，留宿一晚后，第二天再到灵隐寺、净慈寺和昭庆寺等处进香祈福。香积寺也由此得名“运河第一香”。■



我心如秤

撰文 | 夏国哲



京杭大运河以北京、杭州为端点，在中国东部大地上贯穿南北，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因浙东运河的助力，早在两宋时期，浙东地区的商贩便已经将贸易延伸到了东南亚。

有买卖，就必定要求公平，在这之中杆秤凭借着方便携带脱颖而出。不论买卖大小，一杆杆秤，或别在腰间，或放于笼篓之间、货物之上，待买卖来时随手一握秤杆，挂好秤砣，拴好秤盘，架势搭上之后，买卖也就水到渠成。

杆秤，顾名思义就是以杆为秤，其背后运用的正是杠杆的原理。杆秤的称量是以提钮为支点，一边设以秤盘，另一边悬以秤砣。秤杆上镶嵌着代表不同刻度的星花，当秤砣在星花之间游移，便可以称得不同的重量。

民间有句俗语“不识星花，难以当家”，可见，用杆秤称量时不识斤两的人并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恐怕和一杆杆秤上有着大小不同的两个量程有关。大量程的提钮设置在更靠近秤盘的地方；小量程的提钮则更靠近秤尾。量程不同，读数自然不同，相比较而言，大量程的读数更大，小量程的更为精确。而另一方面，在统一调整使用市斤之前，我国的斤与两之间用的是十六进制，即十六两为一斤，所以杆秤上的星花也就钉得更为密实。

用传统工艺制作一杆杆秤要经历一个复杂的流程。从选材、刨圆、打磨，

到钉星花、上色……前后近十道工序，道道工序容不得半点马虎，为的就是称量的精准。而这其中又属制定刻度和星花最为精细。

制定刻度需要制秤匠人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利用一把脚规来回量度，一根秤杆上就划分定盘星、大小量程的斤和两。这密密麻麻的各种记号，旁人是不懂的。杆秤匠用一把极为精致的戳子对着记号打眼，一杆秤上有多少星，便需多少眼。最后，将一段段的细铝丝插入眼中，折断，锉平，便留下了一个个星点。星点的排列结构也成了各秤匠之间辨认自己产品的标识。几百个眼，就要几百次穿插、折断、锉平。

据说为了使买卖人在称量时不昧着良心缺斤短两，这杆秤上代表“两”的星花还有一套说法，即从提钮至秤尾方向的十六星分别为北斗七星、南斗六星以及福禄寿三星。福禄寿三星被设置在靠近秤尾的做法，使得买卖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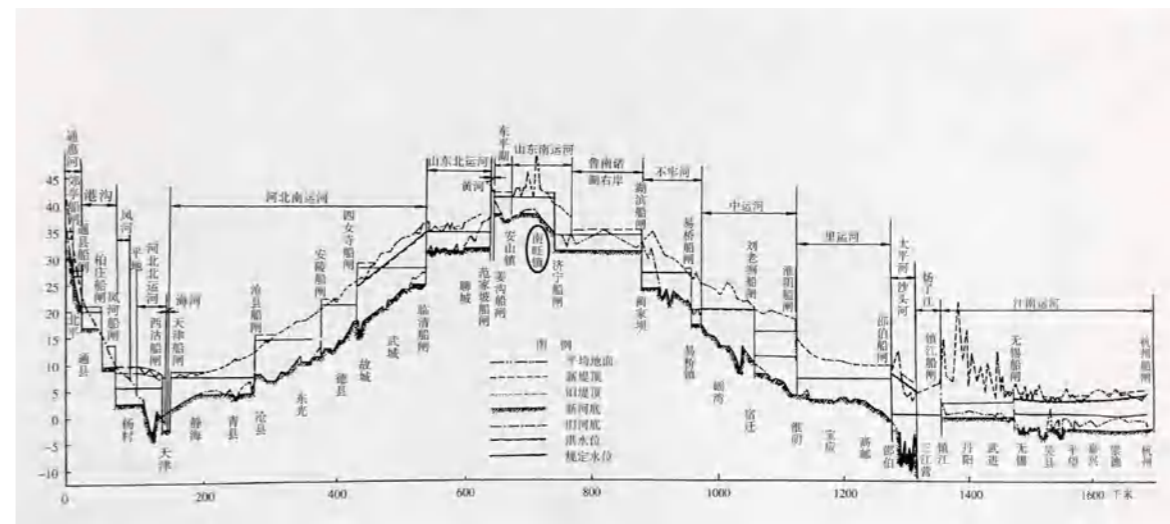
缺一两就损了“福”，缺二两就减了“禄”，缺三两就折了“寿”。当然，无论是买的，还是卖的，都明白谁也不会因为这短缺的斤两而亏损福益，以福禄寿命名这些星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制约。

然而，由于杆秤在称量中无法避免秤杆自身的重量，也因部分买卖人利用杆秤从中牟利，传承千年的杆秤在精准性上逐渐受到质疑。九十年代初期，电子秤的引进取代了杆秤在买卖过程中一枝独秀的地位，因其更方便的称量与读数，短短十年间电子秤便风靡大江南北，而杆秤，也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许多人说电子秤准确，也有人说杆秤传统。其实杆秤也好，电子秤也罢，原本都只是一种衡器，人们追求它们带来的公平，也享受着买与卖之间的情感交流。■





王 戈 / 摄



南旺分水枢纽在京杭大运河纵剖面中的位置图



大运河水脊——南旺分水枢纽

撰文 周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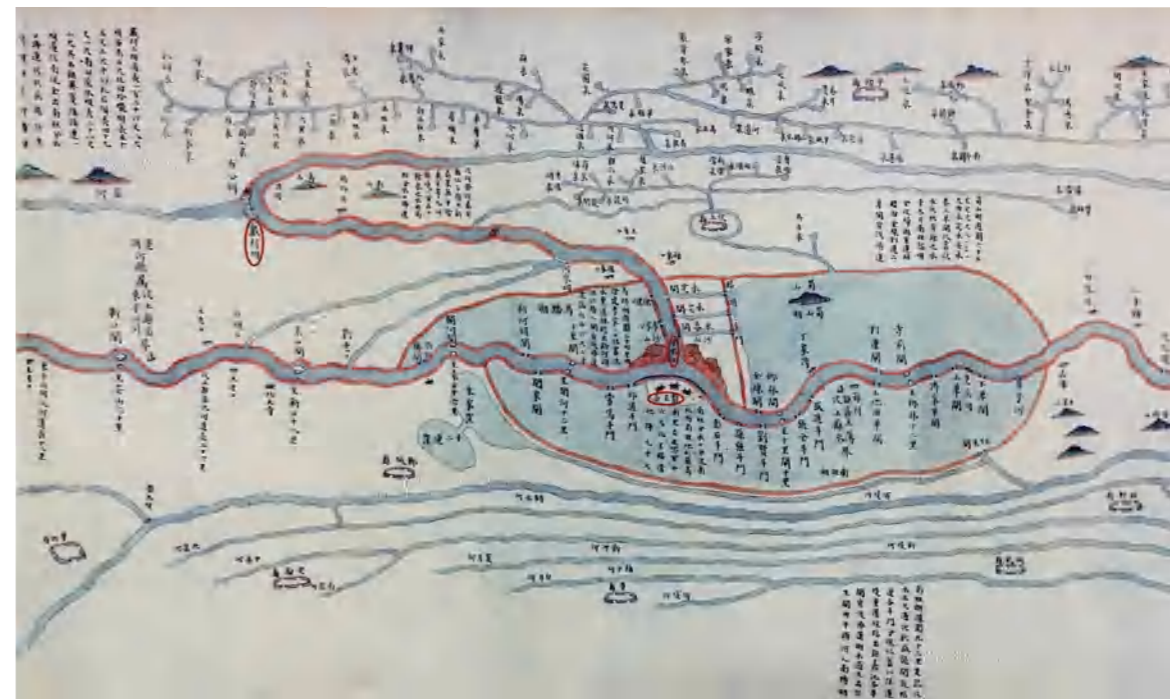
南旺分水枢纽是京杭运河全线“文化”含量最高的工程之一，由引水系统、河道系统和蓄调系统三部分有机组成，整个工程由戴村坝、小汶河、水柜、南旺分水石拨、节制闸共同组成，各个工程项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分别起到引水、蓄水、防洪、泄洪、控水等作用，是京杭大运河上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

一、大运河南旺段地理特征及水系

南旺位于山东省汶上县，是京杭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地方，北接临清，南汇江淮，素有“水脊”之称，关系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通畅。汶上县南旺分水枢纽区域北有大汶河，西有梁济运河南北穿过，还有小汶河和泉河，洸水、泗河、府河，其中大汶河的水量较为充沛。枢纽中还有蓄水湖，称“水柜”：马踏湖、南旺湖、蜀山湖以及济宁城西的马场湖。

运河南旺段属于大运河会通河段，位于泗水和汶水冲积平原的高阜上，海拔高 39 米，史载，比北边的临清高 90 尺（约 30 米），比南边的涪头高 116 尺（约 39 米），是整个京杭大运河海拔最高的点。

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此段运河自开通以来就在通航上存在三个问题：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历史舆图

如何保证船只通过？如何保证水源充足？如何解决河床淤浅？元、明、清三代王朝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

二、南旺分水枢纽的建设背景

元代为了加快漕粮的北运，对原来的南北大运河采取了截弯取直的做法，在山东省境内开济州河和会通河，后来二河常混称为会通河，二河成为一河之两段。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全线通航，舳舻相继，江南的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

由于会通河地势较高，水源匮乏，且河道狭窄水浅，载重较大船只很难通过，元代的漕粮运输仍以海运为主，运河为辅。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境内）（另一说河南黑羊山）决口，洪流泛滥，导致会通河被淤塞，漕运无法继续。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定都北京，恢复运河南北漕运直接关系到政治的稳定和民生的保障，解决运河水源尤其是枯水期水源问题，清淤重开会通河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朝廷，说旧会通河淤塞者有三分之一，浚而通之，并非只是缓解山东之民转输之劳，也是国家无穷之利。明成祖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命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同知周长疏浚会通河。宋礼征调济南、兖州、青州等地民工16.5万余人，将济宁至临清近二百公里的会通河全面疏浚。河“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其中汶上袁家口至寿张沙湾一段，废弃元代旧河，东移10公里另开新河，南北两端接旧河。

这次重新疏浚会通河，地势已与元代大不相同，由于黄河决口洪水屡灌“梁山泊”，致使东平湖一带逐渐淤高，大运河“水脊”已从济宁北移至南旺附近，奈何南旺地势高，水源不足，无水如何成航？解决水源便成了通航的难题。

宋礼一筹莫展，苦思无解，乃“布衣微服，至汶上城东北，访白英与彩山之阳”。白英是在乡间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对于泉源和治水之道经验丰富，见解独到。宋礼诚心求教，白英见其态度虔诚，便根据自己十多年时间掌握的汶上、东平、宁阳、兖州、泰安等二十多个县州的地形水势，提出了“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建议。《明史·宋礼传》记：“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筑戴村坝横亘五里，遏汶流，使无南入洸而北归海，汇诸泉之水尽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谓二道”。宋礼喜出望外欣然采纳，并邀请白英共建这一工程，下令依此设计立即开工建设。

三、南旺分水枢纽的运作

（一）南旺分水

宋礼依白英之计，在东平的戴村筑起一条长126丈8尺（423米）的“戴村坝”，拦住大汶河水；又从戴村坝至南旺分水口开挖一道八十余里长的小汶河，引汶济运，保证南旺段运河有了足够的水源；接下来导泉补源，即收集疏导汶上县东北各山泉汇入泉河至分水；为调节入运之水的南北流量，在至高点建造了一个科学而合理的分水口，被后人称之为“龙王分水”。该分水的建造，先是在小汶河与运河交汇处的丁字口的对岸，即“T”型口处筑砌了



南旺分水枢纽示意图

一道230米长的石砌岸，以消减小汶河水流的冲击；而后在河底部建造了一个鱼脊状的石拨即“鱼嘴”，以石拨将汶水分流南北。改变石拨的形状、方向和位置即可调整南北分流比例。民间所传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说的便是如此。（后经考证，实际分流比例近于六比四，且根据南北用水量不同时进行调整。）由

此顺利解决了运河水源的水位差困难。

（二）设闸过航

闸的作用，就是保持运河水量。建水闸，是为了有效控制水流，调节水量，便利舟楫。

南旺水脊地形复杂，宋礼、白英为调节水量，又相地置闸。《明史·宋礼传》载：“北自临清置闸十七；南至沽头置闸二十有一。”



所置水闸，值人看守，层层节水，以时蓄泄。在南旺以北、以南的运河主干道上，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隆庆元年（1567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3次改道后相继建节制闸38座。《明实录》记载：“（永乐九年六月己卯）会通河成，河以汶、泗为源……自济宁至临清置闸十五，闸置官，立水则，以时启闭，舟行便之。”通过启闭诸闸，一段一段延缓水势，控制水量，以利船只顺利越过南旺水脊，畅通南北。其中，南旺分水口建成后，为控制水流量，节用水源，控制分水量，成化年间，在南旺南北各相距2.5公里处，分别设置了南边的柳林闸和北边的十里闸，称之为“分水龙王庙二闸”，根据水源情况定时启闭闸门控制南北分水量。

《明史·宋礼列传》载：“分水龙王庙二

闸尤为重要，最易斟酌。若浅于南，则当闭北闸，使分北之水亦归于南；浅于北，则闭南闸，使分南之水亦归于北。”也就是说：当北水不足时，开启十里闸，柳林闸严闭，开诸湖放水斗门，水随船北去；如南水紧缺，则闭十里闸，开柳林闸，放水南下，这样一来，就能保证南北过往船只的顺利通过。

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顺治年间曾沿南北大运河游玩，在《北游录·纪程》中记述他经过“南旺水脊”时的情况说：“自济宁至临清凡四百里。总河尚书及水部并驻济宁，申禁特严，此启彼闭，一蓄一泄，日不再启。”“时新筑砖堡，以水浅，上下闸俱毕。待分水庙前泉溢，始放舟。”

（三）保证水源



王戈/摄

1. “四水济运”。元代会通河开通后，为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泗水都漕运副使马之贞建言：“新开会通，并济州汶、泗，相通于河，非自然之流也，应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堰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以六闸搏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南通淮、泗，北以通新开会通河，至于通州。”这就是运河史上所说的“四水济运”。四水是指汶、泗、洸、府。

2. 设置水柜。设水柜，是为调节运河水量的重要工程。由于汛期洪水来量过大，致使沿岸决口成灾，为削减河道流量，宋礼、白英利用运河两岸的洼地创诸湖，建斗门，以调节运河水量。《明史·河渠志》载：宋礼、白英议设水柜，“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在漕河西者曰水柜，东者曰

陡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

宋礼在重浚会通河时，利用安山洼建成了第一个水柜，后又修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三湖围堤，使之变成三个水柜。另把济宁城西一片洼地也辟为水柜，名为马场湖。这样在济宁以北就有马场、南旺、蜀山、马踏、安山五个水柜。运河水浅时，由水柜放水入运；运河水涨时，泄水入水柜。这样，既减轻了小汶河下游洪涝灾害，又能使得枯水季节的运河航行不至中断。

宋礼、白英在引水河道与水柜的关系处理上，抓住了“引、蓄、分、排”四个环节，实现了蓄泄得宜、运用有方。

水柜还有着沉淀泥沙的功能，用以补水至南旺而分流南北的汶河，起源于泰莱山区，落

差极大，而汶水所挟带的泥沙又多，泥沙大部分随洪水进入运河东岸的蜀山湖、马踏湖和西岸的南旺湖等三个“水柜”中，客观上起到了为流入运河的汶水沉淀泥沙的作用。虽有三水柜沉淀泥沙，但仍有一部分泥沙流入运河，造成南旺段运河常常淤浅。后来，人们又在南旺运河的东南方，新挖一条河道，让汶水先流入此河道中，待沉淀澄清后，才放入运河，这段河道俗称“寄沙囊”。然而，诸多措施仍不能避免运河的阻塞，后又有了南旺一带“一年一小挑，两年一大挑”的清淤疏浚定制。

3. 导泉补源。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漕运直达通州而罢海运之后，京杭运河成为朝廷唯一的运输动脉。因此，解决运河水源尤其是枯水期水源问题，成为一项主要任务。

会通河重开7年（永乐十六年），以工部主事顾大奇置分司于宁阳，管理泉源。次年漕运总兵官陈瑄请令顾氏等遍历山川，疏浚泉源济漕运。汶水五源广被泰、蒙诸山，泗水上源多泉，有泉林之称，《水经注》已有较详记载。

宋礼为解决水源，按照白英主张，在兖州、青州、济宁州三州境内挖泉水汇入运河，集汶、泗流域上游山泉二三百眼。白英在各地寻找泉源，

收集和疏导各山泉济运，并将各地山泉登记注册绘制成泉水分布签，每泉派1至4名泉夫看守，只准百姓饮用不许浇地，违者充军，严重的则发配边疆。为加强山泉的管理，明时还设了一个管泉分司，驻宁阳。谈迁在《北游录·纪程》中也记载：“南旺汇七十二泉，跨宁阳、济宁间，即巨野大泽东注也。”由此，通过集泉眼，导四河在济宁、南旺入运，科学解决了运河水源问题。

元、明、清前期，均十分重视运河漕运，尤其是济宁以北段运河，以南旺段为重点，多次进行修浚。至此，大运河南北全线基本确定，水运通畅，保证了近300年航运的畅通无阻，国之命脉得以延续。

至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冲断运河河堤，将运河斩断，漕运逐渐走向衰败。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无奈宣布停止漕运。此后，黄河又多次决口，济宁段运河渐被淤塞，直至断航。民国政府虽进行过局部修浚，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运河航道终究还是日渐萎缩，至20世纪70年代，济宁以北段运河完全断航。■

参考文献：

- ①《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 ②《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
- ③《汶上南旺——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龙王庙古建筑群调查与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 ④《京杭运河巡礼》，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 ⑤《济宁运河档案史料汇集三——明清时代档案珍藏运河彩绘图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
- ⑥《图说大运河——古运回望》，中国书店，2010年1月。

八面来风

INFORMATIVE



中国京杭大运河摄影作品展开幕
 第三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落幕
 拱墅区举办2016年太极导引功表演赛
 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将在杭州举行
 杭州大运河庙会重溯古钱塘盛景
 2016京杭大运河自行车超级挑战赛杭州收车

在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召开 中国大运河摄影作品展开幕仪式



2016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京杭大运河摄影作品展”开幕仪式在大运河南端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召开！拱墅区前区委书记许明、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朋、拱墅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黄玲、副局长戴丽群，以及众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朋友们出席了本次活动。

本次摄影作品展由杭州市拱墅区文广新局和杭州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京杭大运河沿岸八省辖市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旨在通过摄影艺术的形式，庆祝中国京杭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两周年，促进运河沿岸城市摄影家协会之间的艺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展示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扩大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全民对大运河的保护意识。

本次摄影作品展，共展出优秀摄影作品82幅。这些优秀作品，主要是从运河沿岸8省辖市摄影家协会推荐的千余幅作品中精心筛选而来的。这些优秀作品的产生与展出，充分体现了8省市摄影家协会通力合作，运用光影这一摄影艺术语言很好地展现了千年古运河的独特风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运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沿岸城市的发展、变迁。这种以全覆盖的方式展览，达到了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犹如运河从南到北蜿蜒至眼前，栩栩如生、拨动人心。本次展览时间为11月16号至30号，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前往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临展厅进行参观。



精彩故事 精彩童年 杭州市第三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完美落幕

如果说童年是一条小河，故事就是小河里的鱼儿；如果说童年是一首诗，故事就是诗歌的韵脚；如果说童年是一幅画，故事就是画中那最靓丽的色彩……

12月18日，由拱墅区图书馆主办，杭州解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拱墅区教育局和民进拱墅基层委员会协办的第三届“解文杯”运河幼儿故事大赛圆满落幕。

来自杭州各区的30余名小选手在拱墅区图书馆报告厅进行了精彩演绎。

赛场上，小选手轮番上阵，落落大方、声情并茂地向大家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有的故事让人深思，有的故事叫人捧腹，有的故事令人感动，整个比赛过程高潮迭起。小选手们参赛的故事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表现风格各有千秋，让现场的评委不住点头称赞，家长和孩子们感到阵阵惊喜！在他们生动的描述下，故事中一个个可爱的角色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在他们的精彩演绎下，栩栩如生的故事人物，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引发在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和笑声。

下城区幼儿教研员特级教师俞春晓对本次大赛选手们的表现做了精彩点评。对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并勉励他们讲好故事，读好书。

孩子、家长和观众都享受了一场童话故事的饕餮盛宴，期待下一届运河幼儿故事大赛早日开启。





拱墅区举办 2016 年太极导引功表演赛



11月10日，由拱墅区体育局、体育总会主办，区老年体协承办的2016年区太极导引功表演赛在区文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个街道社区健身气功站点的九支队伍100余人参加。获得前三名的分别是：第一名和睦街道代表队，第二名祥符街道代表队，第三名小河街道代表队。



此次表演赛的目的是：大力推广和普及太极导引功，也是对9月份培训班培训效果的一次验收；为下一步的杭州市老年人太极导引功比赛进行一次练兵。



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

撰文 | 王钰晨 吴秋平

一脉运河通南北，千年文明系古今。10月21日，首届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中国新闻社、杭州市人民政府为共同主办单位。

中国大运河历史悠久，流经地域广阔，遗存丰富，价值珍贵。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更是为深入挖掘运河文化，推动运河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基于此，本次论坛以“活世遗·通文脉·游运河”为主题，广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荷兰等国的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以及运河沿岸城市代表，共同探讨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发，推动中国大运河以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论坛旨在为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加强沿岸城市经济带区域合作，同



时挖掘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探讨遗产文化的传承发展，提高中国大运河的国际地位，助力中国传承世遗文化，发展遗产旅游。

大会分享了中国大运河保护与开发经验，中欧在世界遗产保护上的创新思路，日本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以及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典型案例等诸多内容，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地探讨世界遗产，特别是运河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杭州大运河庙会重溯古钱塘盛景

撰文 | 方堃 杨韵仪



图为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庙会上老艺人教一名小学生学刺绣。张茵 / 摄

“南北脉相牵，千年水潋滟。”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历经千年生生不息。10月21日至23日，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庙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再次将游客和市民带回了古钱塘的繁华盛景里。

据悉，第三届大运河庙会以“走不完的运河，看不够的杭州”为主题，分设杭州运河天地、运河广场、桥西历史街区、小河直街、大兜路历史街区、西湖文化广场、塘栖古镇七大会场，分会场涉及传统、民俗、时尚、创意等多个领域，包含了集市、游园会、展览、手工制作等活动。

“小时候的庙会又回来了。”56岁的莫凤英牵着孙子的手，正在拱宸桥畔的大运河庙会集市上慢慢逛着，小泥人、秋梨膏、麦芽糖……作为老底子的杭州人，她对这些都分外熟悉。

除了传统民间小吃和戏曲，庙会上古老的游戏也唤醒“50后”和“60后”们的童年时光。捡沙包、跳橡皮筋、跳格子、拍烟盒……

10月22日，在杭州市大兜路历史街区的“老杭州游园会”活动中，一群60多岁的大妈“返老还童”，顶着白发玩起了童年游戏。



图为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庙会上各式各样打扮的女子观看杭秀。王刚 / 摄



图为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庙会上父亲带孩子观展。

何蒋勇 / 摄

有人在庙会重回童年，有人在盛市中饕餮文化，还有人在运河旁氤氲了幸福……跨越近1800公里、奔流2500年的京杭大运河，正如人们心目中对爱情的期盼“源远流长”，大运河的“河”与“合”谐音，也与婚姻“和美”的愿景相符。

一股“民国风”也刮到了小河直街。穿旗袍的美女、着民国校服的男女学生、穿长衫叫卖糖人的摊主……在小河直街的幽幽青石板路上，一幅幅民国时热闹的街景正在重现。

统计显示，在本届大运河庙会上，有45.8万人共享庙会文化饕餮。市民及游客对运河庙会的总体满意度越来越高，满意度（很好和较好相加）为92.2%，比去年的83.5%提高了8.7个百分点，同时有93.4%的市民及游客表示支持以后继续举办类似于庙会这样的节庆活动。



图为第三届中国大运河庙会上的旗袍秀。

何蒋勇 / 摄



2016 京杭大运河 自行车超级挑战赛杭州收车

撰文 | 曹 飞

11月2日，2016年“阳光100杯”京杭大运河自行车超级挑战赛结束5天征程，收车杭州。在最后一个赛段，来自山西的车手董其成率先冲过终点，成绩为8小时56分14秒。包揽前三个赛段冠军的江苏车手李长春获得本次赛事的总冠军。

第五赛段的比赛从江苏无锡至浙江杭州，全程约261公里。尽管看上去距离不如此前连续两个“400公里+”的赛段，但考虑到车手们已经在前两天高强度的比赛中经历了非常大的消耗，所以当天的比赛对于参赛选手而言同样是一次考验。

最终，李长春以54小时51分08秒的成绩获得本次赛事的总冠军，河南选手张豪以55小时2分04秒的成绩位居次席，河南选手毛文博以55小时24分44秒获得第三名。至此，本次大超赛全部结束，11位选手在5天的时间里实际骑行近1800公里，完成了这项国内有史以来最艰苦的自行车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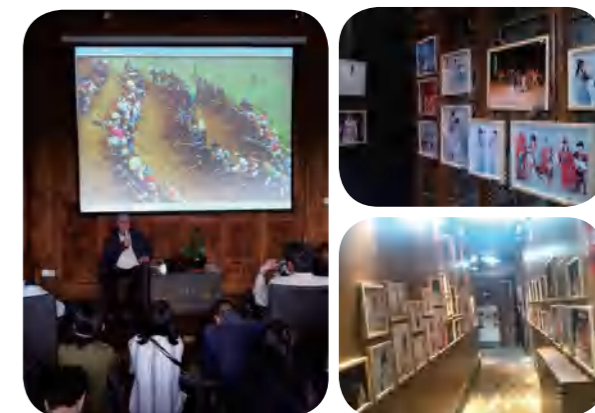
南戏楼——荣华戏园

拱宸桥畔，“荣华戏园”，历史悠久，是当年谭鑫培、刘鸿声、汪笑侗、周信芳、盖叫天先生登台演出过的地方。

当年拱宸桥附近唱戏的茶园有七八家之多，称“阳春”、“天仙”、“丹桂”、“荣华”等等，其中荣华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国益戏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称“大众电影院”。

拱宸桥旧城改造后，大众电影院拆除了，但荣华戏园在拱宸桥东旧址上重新建了起来。荣华戏园又有另外一个名称：荣华茶园。在戏园中喝茶，在茶园中听戏，二者不分彼此。来此演出的多为上海名班中的京剧艺人。在荣华茶园演出过的气最大的京剧巨匠，当属京剧大师谭鑫培。

如今的荣华戏园不仅是市民听戏喝茶的场



所，也是各种文化活动的集散地，2016年先后承担了杭州市民摄影节、2016年“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西湖国际音乐节之初夏祭活动、《美的经纬度》的签名售书活动、法国摄影家讲座等活动。

